

·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探索丛书 ·

GUIYIJUN SHISHI KAO LUN

归义军史事考论

赵贞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探索丛书·



ISBN 978-7-303-10896-1
CIP 数据
北京：北京一... 著页...
编辑委员会

82

归义军史事考论

赵贞著

顾问 何兹全
主任 杨共乐
副主任 李...
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卫东
张皓
侯树梅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地址：北京...
电话：...
邮编：100875

K294.24
Z345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归义军史事考论 / 赵贞著.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4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探索丛书)
ISBN 978-7-303-10896-1

I. ①归… II. ①赵… III. ①地方政府 - 研究 - 敦煌县 - 唐代 IV. ①K29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53459 号

营销中心电话 010-58802181 58808006
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分社网 <http://gaojiao.bnup.com.cn>
电子信箱 beishidal68@126.com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cn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印 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70 mm × 230 mm
印 张: 21.75
字 数: 282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00 元

策划编辑: 李雪洁 责任编辑: 李雪洁
美术编辑: 褚苑苑 装帧设计: 褚苑苑
责任校对: 李 茵 责任印制: 李 丽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 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10-58800825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探索丛书

编辑委员会

顾 问 何兹全 龚书铎 刘家 and 瞿林东 陈其泰

郑师渠 晁福林

主 任 杨共乐

副主任 李 帆 易 宁

委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卫东 王开玺 王冠英 宁 欣 汝企和

张 皓 张 越 张荣强 张建华 郑 林

侯树栋 耿向东 梅雪芹

出版说明

在北京师范大学的百余年发展历程中，历史学科始终占有重要地位。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今天的北师大历史学院业已成为史学研究的重要基地，是国家“211”和“985”工程重点建设单位，首批博士学位一级学科授予权单位。拥有国家重点学科、博士后流动站、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等一系列学术平台。科研实力颇为雄厚，在学术界声誉卓著。

近年来，北师大历史学院的教师们潜心学术，以探索精神攻关，陆续完成了众多具有原创性的成果，在历史学各分支学科的研究上连创佳绩，始终处于学科前沿。特别是崭露头角的部分中青年学者的作品，已在学术界引起较大反响。为了集中展示北师大历史学院的这些探索性成果，也为了给中青年学者的后续发展创造更好条件，我们组编了这套“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探索丛书”，希冀在促进北师大历史学科更好发展的同时，为学术界和全社会贡献一批真正立得住的学术力作。这些作品或为专题著作，或为论文结集，但内在的探索精神始终如一。

当然，作为探索丛书，特别是以中青年学者作品为主的学术丛书，不成熟乃至疏漏之处在所难免，还望学界同仁不吝赐教。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探索丛书编辑委员会
2010年3月

凡 例

本书在征引敦煌文献时，尽量遵从学界通行的规范（参见郝春文编著《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凡例），但在个别地方为行文方便，又与敦煌学的常规略有不同。

第一，原件残缺，依残缺位置分别用（前缺）、（中缺）、（后缺）表示。因残缺造成缺字者，用□表示；不能确知缺几个字的，上缺用□表示，中缺用□表示，下缺用□表示。

第二，凡缺字可据别本或上下文义补足时，将所补之字置于□内。如“文”表示“文”字已残，但可据文义或其他写本补全；凡有脱文、漏字而可补足时，将所补之字置于[]内。如“[文]”表示“文”字原件已漏，但可据文义或其他写本补全。

第三，凡文字模糊，无法辨识者，或字迹清晰，但不识者均以□表示；不能肯定的释读，在该字后注以(?)，以示存疑。

第四，原件中的同音假借字照录，但用()在该字之后注出本字。

第五，凡文献卷号出现“V”字者，表示此卷的背面文书；两件以上的文书中出现“+”号者，表示这几件文书可以拼接或缀合。

第六，本书在征引敦煌文献时，采用学界通行的缩略语。S. 表示伦敦

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献斯坦因编号；S. P. 表示伦敦英国国家图书馆藏印本敦煌文献斯坦因编号；Ch. 表示伦敦英国国家博物馆藏敦煌绢纸画编号；P. 表示巴黎法国国立图书馆藏敦煌文献伯希和编号；P. t. 表示巴黎法国国立图书馆藏敦煌藏文文献伯希和编号；Дx. 表示圣彼得堡俄罗斯联邦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藏敦煌文献编号；Φ. 表示圣彼得堡俄罗斯联邦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藏敦煌文献弗鲁格编号；北图藏某字某号表示北京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献千字文编号；BD. 表示中国国家图书馆(原北京图书馆)藏敦煌文献编号；敦研某号表示敦煌研究院(前身为敦煌文物研究所)藏敦煌文献编号。

前 言

长期以来，归义军史一直是敦煌学研究的热点。国内外学者围绕张氏和曹氏的政局、职官、外交、族属、民族关系、寺院经济及宗教信仰等方面，发表了大量的研究成果。藤枝晃^①、土肥义和^②、荣新江^③、郑炳林^④、冯培红^⑤、刘进宝^⑥等学者，在归义军史研究中都取得了重要成果，由此解决了一系列重大问题。近年来，杨宝玉、吴丽娱、李军等，又对张

① 藤枝晃：《沙州归义军节度使始末》，载《东方学报》(京都)，第12册第3、第4分，1942；《东方学报》，第13册第1、第2分，1943；中译文参见《沙州归义军节度使始末》，载《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8。

② [日]土肥义和：《归义军(唐后期·五代·宋初)时代》，参见榎一雄主编：《讲座敦煌》第2卷《敦煌の历史》，233~296页，东京，大东出版社，1980；中译文参见《归义军(晚唐、五代、宋)时期的敦煌》，李永宁译，《敦煌研究》，1986(4)、1987(1)。

③ 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④ 郑炳林主编：《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7；《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续编》，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三编》，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5。

⑤ 冯培红：《敦煌归义军职官制度——唐五代藩镇个案研究》，兰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

⑥ 刘进宝：《唐宋之际归义军经济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氏归义军经略河西、曹氏归义军遣使及与甘州回鹘的关系等问题予以探讨^①，进一步推动了归义军史的研究。

本书对归义军史的关注，可以简化为押衙、鸟形押、城坊、赛神和灵州道五个论题，实际上是对归义军史的专题研究。这些论题都是从某一侧面对归义军时期的职官、遣使、对外交通及社会生活进行探讨，相信对了解唐宋时期的敦煌社会有所帮助。

归义军时期，节度押衙是归义军政权的中坚支柱和核心力量。押衙由于兼知他官而广泛充斥于归义军职官的各个阶层，武职军将如兵马使、都虞候、都指挥使、排阵使、游奕使、将头等，文职僚佐如节度参谋、州学博士、孔目官、进奏官、营田使、节院使等，衙内诸司如客司、宴设司、军资库司、柴场司、水司、羊司、酒司、内宅司等，基层行政官员如县令、军使、镇使、乡官、耆寿等，作坊艺匠如画匠、画行都料、雕版押衙等，均可由押衙(都押衙)兼任。这说明节度押衙是构建归义军政权整个职官系统的核心和基础。节度使主通过押衙之手，将各个阶层的官员都纳入归义军府衙直属的职官系统中，从而扩大了归义军政权的统治基础。同时，节度押衙由于出自使府衙内，“出入旄旌之侧”，深得节度使的信任，因而使主又通过押衙之手将管内的军政大权集中到自己手中，从而有利于巩固和加强其统治秩序。正是由于押衙的这种特殊地位，沟通归义军对外联系与交往的使节，也多由节度押衙来充任^②。

曹氏归义军时期，沙州的内政外交呈现出灵活务实的特征。在对外交

^① 吴丽娱、杨宝玉：《P. 3197v〈曹氏归义军时期甘州使人书状〉考释》，《敦煌学辑刊》，2005(4)；杨宝玉、吴丽娱：《P. 3016v〈△乙致令公状〉考释》，《敦煌研究》，2006(3)；《P. 2992v书状与清泰元年及长兴元年归义军政权的朝贡活动》，《敦煌学辑刊》，2007(1)；《归义军朝贡使张保山生平考察与相关历史问题》，《中国史研究》，2007(4)；李军：《敦煌写本〈归义军僧官书仪〉拼接缀合及相关问题研究》，《敦煌学辑刊》，2006(3)；《晚唐(公元861—907年)凉州相关问题考察——以凉州控制权的转移为中心》，《中国史研究》，2006(4)；《晚唐政府对河西东部地区的经营》，《历史研究》，2007(4)。

^② 从P. 2962《张议潮变文》“押衙陈元弘走至沙州界内”、日本有邻馆藏文书中的“副使朔方押牙康元诚”、P. 2945《归义军兵马留后使状》第六件“有劳跋涉□□□(裴押衙)至此”，P. 2539v《沙州令公书》“今差押衙孟元立等”来看，中原王朝派遣入驻沙州的使节也多以押衙充任。

往中，归义军频繁遣使，竭力与周边民族及中原王朝保持良好关系。在内部事务的处理中，归义军提高了节度使的权力，并确立了由节度使本人亲自勾稽、审核衙内诸司物资消费和财务支出的管理制度。这在以“为凭”为标志的诸司上状及使主判决中有明确体现(P. 2641、P. 3160、S. 3728、P. 3272、S. 5571、S. 5590、P. 3878、S. 2474、P. 2737)。在这些状文中，节度使的亲笔签署常用一种绘有鸟形图案的押记(鸟形押)来代替，这在曹氏家族中两位杰出的代表人物曹元忠和曹延禄执政时期得到了广泛使用。作为一种形象化的图案标识，鸟形押其实被赋予了归义军节度使权力与命令的象征意义，很大程度上它是曹氏家族统治敦煌的一种强化手段，也是曹氏归义军政权的一种标志性符号。曹氏家族的签署为何选用鸟形图案，对此我们也无法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释，只能就现有材料推测：曾经占领敦煌的吐蕃人对飞鸟的灵异性有特殊的敏感，常常根据飞鸟(如乌鸦)的飞向、鸣声和食物来占卜吉凶(P. T. 1045 藏文卷子)。这种《乌鸣占》文献在张氏归义军时期仍然存在(P. 3479、P. 3988)^①。至10世纪初，正当归义军节度使张承奉建立西汉金山国之际，白雀作为一种祥瑞之鸟适时地出现了(P. 2594+P. 2864)。稍后，曹氏归义军的开创者——曹议金上台时，宣示帝王受命的吉祥之鸟又从白雀变为白鹰(S. 1655)。从这些迹象来看，鸟形押的使用可能与敦煌流行的飞鸟占卜及飞鸟祥瑞有关。

^① 关于敦煌写本中的乌鸣占和吐蕃时期的鸟占卜，法国学者茅甘、中国学者王尧、陈践、杨士宏、陈楠等均有专文探讨。参见[法]茅甘：《敦煌汉藏文写本中的乌鸣占凶吉书》，《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8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2；茅甘：《敦煌写本中的乌鸣占凶吉书》，《法国学者敦煌学论文选萃》，北京，中华书局，1993；王尧、陈践：《吐蕃时期的占卜研究——敦煌藏文写卷P. T. 1047、1055号译释》，《世界宗教研究》，1985(3)；《吐蕃的鸟卜研究——伯字1045号卷子译解》，《藏学研究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1985；《吐蕃的鸟卜研究——P. T. 1045号卷子译解》，《敦煌吐蕃文书论文集》，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7；王尧：《三探吐蕃卜辞——伦敦印度事务部图书馆所藏藏文占卜文书译释》，《青海社会科学》，1987(3)；王尧、陈践：《吐蕃时期的占卜研究》，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7；杨士宏：《敦煌古藏文残卷〈乌鸣占卜法〉译释并探源》，《西北民族研究》，1988(2)；陈楠：《敦煌藏汉鸟卜文书比较研究——P. T. 1045号、P. 3988号与P. 3479号文书解析》，《敦煌吐蕃研究》第10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归义军时期，沙州作为使府衙门的驻地，其形制与唐前期的敦煌郡完全相同。作为缘边丝路重镇和州县城市，沙州亦置有子城、罗城和瓮城，其中节度使府衙的官楼设在子城内。因官楼上建有天王堂，官楼前又有佛寺兰若，所以使得沙州官衙渗透着浓厚的佛教文化氛围。从材料来看，子城不仅是归义军使府、廨舍、宅第、佛寺的汇聚之地，还是社司举办局席、营葬、燃灯等社会活动的重要场所。子城的重心区域设有“六街”，归义军置有“知六街务”、“知街院”等官，负责城内主干街道的治安管理。此外，归义军衙内总管马步军军纪的马步都虞候，亦兼管“六街”治安事务的巡察与管理。

仿照唐代长安、洛阳的基本格局，沙州城设有儒风坊、永宁坊、修文坊、钦贤坊、政教坊、修仁坊、博望坊、定难坊、释教坊等17坊。除释教坊因为僧官、僧人设置而具有弘扬佛法的意味外，其他城坊的取名或是寄托着对先贤历史人物的怀念和崇敬，或与儒家倡导的治国理念、道德风范有关，或是参照或借用了唐两京城坊名称的某些字词，因而打上了儒家文化的深刻烙印。作为僧俗官民百姓日常的居住区域和生活场所，城坊内开展社邑互助、坊巷教育，做佛事功德、宅舍交易等多种社会文化活动，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唐宋之际敦煌民众的社会生活。

归义军时期，官方举行的赛神活动既是沙州祭祀礼仪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敦煌民俗文化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这些赛神中，依其性质、职能和神祇而言，大体可分为七种类型：第一，传统祈农神祇。如风伯、雨师、社神、五谷神等，这些传统的祈农神祇主要着眼于风调雨顺和五谷丰登的恩泽，无论是奉祀时间还是主祭仪式，这些赛神都与中原王朝的祭祀礼仪保持一致，应是中原礼制在敦煌传承的反映。第二，绿洲农业神祇。如青苗神和结葡萄赛神，这是敦煌绿洲农业(包括园圃业)的保护神，带有浓厚的地方特色。第三，畜牧业神祇。如驼马神、马神、官羊神、驼儿入草泽赛神、马群入草泽赛神、水草神等，这是护佑沙州驼马兴旺，羊群繁盛，水草丰茂和畜牧业发达的神祇。第四，手工业神祇。如杜康神(酒神)、石匠工场赛神，是保佑本行业兴旺发达的行业神。第五，丝路神祇。如袄神和行路神，前者是丝路贸易中至为活跃的商胡(特别是粟特部

落)敬奉的神祇,后者则是确保使节、商旅和行人道途安泰,人身安全的神祇。就共同性而言,此二神其实都是丝路往来人员的保护神,是敦煌在丝路贸易中咽喉与枢纽地位的写照。第六,河渠水利神祇。如张女郎神,是民间供奉的雨水之神。而马圈口赛神、都乡口赛神、平河口赛神、百尺下赛神、东水池赛神和鹿家泉赛神等,俱是向瓜、沙绿洲水系上的河神祈祷,以求神灵护佑瓜、沙河水充足,水源丰富。第七,城池保护神。如赛天王(毗沙门天王)、金鞍山神、城隍神等,这是保佑瓜、沙城池安泰,边境安全,民丰安乐,人杰地灵的地方神,自然也是归义军政权的保护神。综合起来,上述七种类型的神祇,其实都是护佑敦煌绿洲发展和繁荣的保护神^①。沙州官衙频繁的举办各种赛神活动,看似弥漫着浓厚的“淫祀”风气,其实正是归义军立足敦煌,积极经营瓜、沙绿洲的反映。

归义军时期,沙州向外辐射的对外交往四通八达。其中西北通西州的大海道,北通伊州的稍竿道,西南至于阕的于阕道,以及东通中原的瓜沙河西道尤为发达^②。就沙州遣使中原而言,当时绕道经过朔方重镇灵州的

^① 余欣在《神祇的“碎化”：唐宋敦煌社祭变迁研究》[《历史研究》，2006(3)]中指出，归义军时期，社祭似乎有逐渐衰落乃至消亡的趋势。社神职能被诸多新兴神祇所取代或其他传统神祇所侵夺。种植业方面有青苗神和葡萄神，畜牧业方面有驼马神、马神、官羊神，承担风调雨顺职责的有玉女娘子、风伯、雨师以及张女郎神等，社神存在的合法性被抽空，由此逐步淡出历史舞台。其实，社祭衰落的根本原因在于社神不能适应绿洲社会的发展。敦煌是绿洲城市，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和商业(丝路贸易)的发展，都离不开水源的供给。显然，一年春、秋两祭的社祭活动远远满足不了敦煌社会的客观需求。因此，为解决实际问题，敦煌民众塑造了实用性很强的各种神祇，并依照四时节气的变化举行相应的祭祀活动，以此来护佑敦煌绿洲的发展和繁荣。比如春夏之际的四月，正是万物生长、草木茂盛的时节，自然也是驱赶驼儿马群进入草泽就食的绝佳时机，故在此时举行驼儿马群赛神，具有驼马繁盛、畜牧业兴旺的象征意义。但社祭显然没有这样的功能。

^② 参见李并成：《唐代河西走廊交通道路考》，《丝绸之路》(学术研究专辑)，2009(6)。

路线即灵州道成为继回鹘路后中西交往的主要通道^①。自大中年间张议潮率众驱蕃、遣使献捷及灵州道开通以来，灵州道一直与归义军并行发展，无有停绝。中间虽因凉州嗾末、甘州回鹘和党项的侵扰而略有阻隔，但都无关乎灵州道地位的削弱。相反在归义军、甘州回鹘、西凉六谷蕃及党项对丝路通道的争夺中，灵州道备受瞩目。宋咸平五年(1002)，灵州为党项所陷，由此灵州道渐趋沉寂。而耐人寻味的是归义军也于咸平五年发生政变，曹氏归义军元气大伤，而目前所知最晚的藏经洞出土文书亦在此时^②，藏经洞大致亦在同期封闭^③。因此，从时间跨度来看，灵州道的开通、发展、演变与沉寂，似与归义军历史相始终。灵州道由于是沙州归义军遣使中原并汲取有用营养的必由之路，因而也是归义军史研究的重要内容。

若以灵州为中心，灵州道其实分为东、西两段。西段即自灵州抵达河西的路线。从文献来看，西段有灵州—凉州道和灵州—甘州道两种走法。由于这两种走法都要横穿大漠沙碛，因而行程比较艰险。东段即自长安经

① 关于回鹘路，史书记载较多，《通鉴》卷二二七，德宗建中二年“遣使回鹘历诸胡自回鹘中来”，同书卷二三二，德宗贞元三年“当今假道于回鹘”，同书卷二三三，德宗贞元五年“安西北庭皆假道于回鹘以奏事”。《册府元龟》卷九九四《外臣部·备御七》载：“承平时向西路自河西陇右出玉门关。……自艰难已后，河陇尽陷吐蕃，若通安西北庭，须取回鹘路去。”(11763页)关于回鹘路的辟通及走向，可参阅陈俊谋：《试论回鹘路的开通及其对回鹘的影响》，《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7(2)。

② 俄藏敦煌文献Φ.032B、Φ.032C两件均为《敦煌王与济北郡夫人汜氏捐经记》，文字大致略同，分别题有“大宋咸平五年壬寅岁七月十五日”、“大宋咸平五年壬寅岁五月十五日”，是现知藏经洞文献中时间最晚的文书。其中Φ.032C云：“施主敦煌王曹宗寿与济北郡夫人汜氏同发信心，命当府匠人编造帙子及添写卷轴，入报恩寺藏讫。维大宋咸平五年壬寅岁五月十五日日记。”参见《俄藏敦煌文献》第1册，321、322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③ 白滨先生在《试论敦煌藏经洞的封闭年代》中指出，从现有情况可知，敦煌遗书纪年最晚者是宋咸平五年(1002)，因而藏经洞的封闭当在宋咸平年间或稍后的年代里是比较合理的。荣新江也认为：“从现存写本年代的累计，可知藏经洞的封闭应在1002年以后不久，不应晚到伯希和提出的1035年西夏的到来。伯希和时代，人们对西北历史的了解还比较有限，因此找了一些较晚的历史事件来解释藏经洞的封闭原因和年代。在经过多年来对唐宋时期西北历史的探讨之后，我以为最有可能促成藏经洞封闭的事件，是1006年于阗王国灭于黑韩王朝一事。”分见《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石窟艺术编上》，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敦煌学十八讲》，91~92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邠宁路而至灵州的路线。具体来说，从长安出发，西北行经邠州—宁州—庆州—一线而至灵州，其中邠州的地位尤为重要。事实上，这条以灵州为中心连接中原与西域遣使和贸易往来的交通道路，大致在1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后已普遍为人们所熟知。在同期的一件《学童习字杂抄》中(P.3644)，抄有“入京般次、朔方使、邠州”，“凤翔使、灵州”，“达担、回鹘使、汉使入城，般次天使馆驿，供备食料，肥羊甚好，看待使命”，“朔方军先登定难都指挥使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尚书左仆射赐紫金鱼袋”等文字^①，这说明曹氏归义军与中原王朝的使节往来非常频繁，经由邠州、灵州而达河西(沙州)的道路已成为敦煌民众(乃至学童)的一般常识，以致在当时的习字抄件中才会出现“般次”、“朔方使”、“灵州”、“天使”等字样。

归义军时期，灵州道还是一条民族流徙及迁转之路。当时散布于灵州道上的民族有肃州龙家、甘州回鹘、凉州嗚末、西凉六谷蕃，以及在灵州、庆州间活动的党项，都对灵州道的通畅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在此过程中，朔方(灵武)节度使在沟通东西交往、确保灵州道的畅通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一方面，朔方节度使联合邠州、庆州二镇，抗击在灵州东、西两侧出没的党项，保证河西朝贡使节安全往来；另一方面，晚唐五代的

^① 图版参见《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6册，200~202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按，P.3644是一件很重要的识字教育文书，卷中提到了曹氏归义军时期诸多方面的背景知识(如衣装、器物、特产、公文、诗词、职官等)，黄永武《敦煌宝藏》定名为《俗务要名林》，王重民《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施萍婷《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定名为《习书残卷》，《法藏》定名为《类书习字》。卷中抄有礼五台山诗四首，今当圣人诗一首。另有店铺招徕叫卖口号二首，李正宇有详细考证，并判定此件为后唐同光年间(923—926)所抄(参见《叫卖市声之祖——敦煌遗书中的店铺叫卖口号》，《寻根》，1997(4)；《敦煌学导论》，321~324页，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8)。又卷中提到“瓜州刺史慕容归盈、悬泉镇遏使常乐县令寿昌县令张信盈”，慕容归盈执掌瓜州大致在后梁乾化四年(914)至后晋天福五年(940)，张信盈又见于P.4638《清泰四年(937)都僧统龙辩牒》“谨遣都头张信盈往彼驰状陈谢”中，参照P.2814《后唐天成三年(928)都头知悬泉镇遏使状》、P.2482《归义军内亲从都头守常乐县令阴善雄墓志铭》、P.3718《归义军都头守常乐县令薛善通遯真赞》可知，曹氏归义军时期，经常以都头(内亲从都头)兼知镇使、县令之职。据此，张信盈担任悬泉镇遏使常乐县令寿昌县令恐在天福二年(937)左右，如此，本件当抄于后晋天福二至五年间(937—940)。又敦煌所出后晋天福十年(945)所抄《寿昌县地境》题有“州学博士翟上寿昌张县令《地境》一本”，此处“张县令”当指张信盈。

朔方节度使由于兼领河西，故常派遣使节安抚、慰问河西诸州，行使“观察”之权和“押蕃落”之责，因而对河西强蕃甘州回鹘也有相当的影响力。朔方节度使还积极招引、接洽西域诸国（如西州回鹘、于阗等）和河西诸州（沙州、瓜州、甘州）的朝贡使节，“在中国天朝与其西北边陲一些小领地关系中充当了调解人的角色”^①，这在朔方韩氏对灵州道的经营中有明确体现。

朔方节度使对灵州道的主导作用，还表现在对管内本府僧中大德的尊崇与关照，由此也引导了灵州道上的佛教文化流传，使得灵州道也成为沟通东西佛教文化交流的要道。无论是西行天竺、于阗的中原僧人，还是东来长安、五台山的西域僧侣，他们作为佛教流传的使者，为弘扬佛法络绎不绝地穿梭于灵州道上，从而赋予了灵州道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重要意义。

以上所述，就是本书着力阐释的主要内容。此外，结合汉唐少数民族的慕义归化和纳款投诚，书中还对“归义”一词的内涵和回鹘归义军进行论述。当然，由于学识肤浅，视野有限，故考证粗疏、挂一漏万之处，尚不在少数。敬请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① [法]哈密顿：《五代回鹘史料》，21～32页，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

目 录

第一章 归义与归义军	1
一、归义与归义军	1
二、回鹘归义军始末	13
第二章 归义军时期的押衙与鸟形押	25
一、归义军押衙兼知他官略考	25
二、归义军对外交往中的押衙	37
三、归义军曹氏时期的鸟形押研究	47
附：唐代对外交往中的译官	73
第三章 归义军时期的城坊与赛神	86
一、归义军时期的沙州城形制与城坊	86
二、归义军时期的“赛神”略考	105
第四章 归义军时期的灵州道研究(上)	140
一、灵州道的渊源	144
二、灵州道的开通	148

三、灵州道的大致走向	157
第五章 归义军时期的灵州道研究(中)	176
一、凉州嗚末和西凉六谷蕃	176
二、甘州回鹘	184
三、灵庆党项	188
四、附说青海道与回鹘路	192
附：吐蕃攻陷凉州及对灵州、庭州的争夺	195
第六章 归义军时期的灵州道研究(下)	209
一、晚唐五代朔方节度使对灵州道的经营	209
二、灵州道上的佛教文化交流	232
三、归义军与中原王朝之间的使节来往	241
附录一：敦煌遗书中的唐代星占著作——〈西秦五州占〉	260
附录二：敦煌文书中的“七星人命属法”释证——以 P. 2675bis 为中心	272
附录三：“九曜行年”略说——以 P. 3779 为中心	286
附录四：唐宋之际敦煌民众葬地略说	307
参考文献	316
后 记	326